

近代早期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特殊性之成因^①

袁新洁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1874年,以“立言”为目的《循环日报》的创办,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发轫。纵观世界报刊史,“文人论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枝独秀,并形成优良传统。其孕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根源,既源于西方,又区别于西方;在宗旨上,它以政论为灵魂;在实践上,则以致用为目的,新闻救国,言论报国。

关键词: 近代早期报刊;《循环日报》;“文人论政”传统

中图分类号: G210;K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3-0058-04

The Forming Tradition of“Literati Discussing Politics”in the Early Modern Newspaper

YUAN Xin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Abstract: In 1874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whose purpose is to “raise its voice”, marked the commencement of “literati discussing politics”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in the world, “literati discussing politics” outshined and formed a good tradition. Its birth had a complicated ideological root which originated from but differed from the west. Political discussion is its soul and purpose while in practice, application is its purpose. Newspaper saves the country and its voice is also for the country.

Key words: early modern newspaper;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i discussing politics”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大地鸡鸣不已,风雨如晦,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感于国势的威迫,“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积极入世,勇敢担当。他们借助报刊这种新载体,抒发言论,评议时政,激浊扬清,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展现出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一改以往中国报刊以传抄上谕、刊载章奏为主要内容的办报方式,转而以“立言”为目的,首创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发轫。王韬以降,我国近现代报刊无不以这一传统为标榜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些报刊的实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报刊的变革与发展。纵观世界报刊史,“文人论政”之所以在中国一枝独秀,并形成

优良传统,其孕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根源,及独特的表达方式和鲜明的主体取向。本文拟就我国近代早期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特殊性之成因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在思想上:既源于西方,又区别于西方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批批民营报刊和报人在困境中成长起来,逐渐孕生了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应该说,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的影响与渗入密不可分。近代报刊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邸报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具有独立的撰稿权并发表评论,而这一点又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客观上讲,如果不

① 收稿日期: 2010-04-12

作者简介: 袁新洁(1970-),男,湖南永顺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编辑,主要从事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研究。

是外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当时严厉的封建统治下,中国是不会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更罔论“文人论政”了。^[1]

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影响和渗入中国,发挥主渠道作用的是传教士报刊。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形成之前,中国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是在华外报。据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统计,从1815年到1894年,全国除《京报》外,共计出版近代中文报刊76种,其中60%为教会方面所办。^[2]这些传教士报刊,除传播教义外,大都以宣传西方文化和近代科技知识为己任,在宣传策略上特别注重附会儒学。从本质上说,这些报刊都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最终将中国推向殖民地的道路。但从客观上讲,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通过交流,使中国固有的文化提升了一步。如马礼逊在他的报刊《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3]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4]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等,对几千年来处于封建禁锢下的中国民众起到了深刻的思想启蒙作用。此外,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和建议也对中国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加快了自由主义办刊理念在中国的传播。1867-1869年间,王韬漫游西欧,他发现西方的报刊自由对文明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他以为西方所长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具有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他游历欧西诸国后,就热切向往着有朝一日在中国大地上也能自由办报,出现“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的状况^[5]。他在国内第一个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于是才有了处处模仿《泰晤士报》的《循环日报》的创刊。该报后来被誉为我国“文人论政”的第一样板,王韬也博得了“中国新闻报刊之父”的雅号。他的办报实践,发扬了古典自由主义学中最有价值的民主和自由理念的部分。此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向日本学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在历史提供的机遇前,中国报人通过日本辗转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西新闻是同源的;西方

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也成为我国报刊“文人论政”传统成因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对报刊与新闻的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全盘接收和认同来自西方的理念,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直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关于这一点,就连外国传教士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报刊特别是报刊言论,进入中国后都“本土化”了,为了便于清廷接受,在陈述办报理由时,不是从天赋人权、宗教宽容等出发来论证新闻自由的合理性,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报刊的沟通中外、沟通上下、富国强兵的功能,并进一步将近代的报刊比附于中国古代的谏鼓谤木。这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理论混乱和国人理解的歧义,但在主观上却为他们的报刊自由进入中国制造了舆论,并得以落地生根。

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说,任何新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6]进口的西学,为近代中国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提供了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没有本民族文化的接受机制和依托形式,哪怕是生命力再强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同样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近代新闻理念和事业,是西方的舶来品,之所以形成不同于其鼻祖的新闻理念和事业,是因为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经过了中国人有目的、有选择地吸收并加以改造。这也是“文人论政”传统在中国得以发轫并表现特殊的重要原因。

二、在宗旨上:以政论为灵魂

我国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出现,报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清醒地意识到报刊在推行政治主张方面的巨大作用。为了发挥这一作用,他们在专制体制不许可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极大的风险创办报刊,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言论报国、文章救国的理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报刊中,为世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言论,而非具体的新闻;新闻在

很大程度也是服从于言论的需要,言论特别是政论成为这些报刊真正的灵魂。

我们知道,近代早期以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舆论还只是士大夫的意见和知识界的意见。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以“修、齐、治、平”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士子文人研究学问,拥有文化知识,只能附丽于政治,“仕”成为学问高深的唯一结果和标志。在这一前提下,他们的言论倾向最终都被政治功能所掩盖,成为统治阶级意志下的“舆论一律”。而现实是,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顺利达成“入仕”的最终理想,更多的人只能失落地徘徊在官场之外,“报国无门”,于是渐入颓唐。另一方面,当时清廷的官报(通称“邸报”)、民间报刊如辕门抄、“京报”等,也沿袭了中国历代官报的表达方式,其内容主要是宫门抄、上谕和臣僚章奏等,最大的“特色”是无独立新闻,亦无任何评论,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默许下的传声筒。

进入19世纪中期,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西风东渐,势不可挡。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变化是居于首位的。中文的西方外报,从开始的躲躲藏藏、欲言又止,到现在堂而皇之在华夏登堂入室,其传播效果显而易见。传教士报刊,特别是在华的外文报刊,其鲜明的言论观点,无论它站在何种立场上,这一表达形式都深深触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外报的示范下,国人看到一个全新的媒介,在沟通社会、反映舆情、宣传新思想、新知识上的巨大作用,它没有像邸报一样局限于只记录朝廷政事,而是通过广泛的新闻报道和比较贴近社会的时评、社论,及时反映舆情,反映进步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呼声。让那些仕途不顺、有才不能伸的人士,寻找到了一条自我实现的新途径。而报刊的社论、时评等言论栏目,成为最能反映他们的政治理想以及抒发他们的报国理念的载体。王韬深知报刊在西方国家的重要性,他感到,报刊除了作为一般收集传播有关各种事情消息的载体外,还应该对政治领域发挥批判的作用。而他认定的途径,是在无法取得皇权的开明恩赐的情况下,通过报刊,通过旗帜鲜明的报刊言论,来达到他所看到的《泰晤士报》所产生的影响,“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最终在中国能够出现他理想中的“士庶”与“宰辅公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和“清议所至,足以维持

大局。主笔之事,位至卿相。国有大战事,投笔从戎,随营纪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的动人局面。^[5]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韬明确提出“日报立言”的观点,在主持《循环日报》时,他像《泰晤士报》一样,在每期的首栏中发表一篇针对时局的“论说”,带有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亲自撰写的质高量多的政论。从70年代起,他的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得到了同时代人愈来愈多的承认,一些官吏也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这些政论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成为后来维新思想家的启蒙性范文,有力推动了中国报刊政论文章的发展,也开创了“文人论政”传统的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从总体而言,王韬对近现代新闻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推动作用。正如吕实强所说,他表明不做大官也能做大事。此后的改良派报刊政论家以王韬为榜样,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论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三、在实践上:以致用为目的

近代报刊的中心任务就是新闻救国、言论报国,“文人论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一思想及由它引发的行动,像一条红线贯穿了近代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经世致用”所具有的关注现实的学术精神,使得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们能够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而去探求救世“良方”;“经世致用”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们勇于冲破传统,承认“夷人”比自己强,并且去探求强之所在;“经世致用”所包含的不同于唯理论思维的功利价值观,为接纳异质文化留下了一方天地;而“经世致用”所倡导的“变易”思想,又推动思想家们不再留恋“祖宗”和成法,其思考和探索活动随着形势变化而向前推进。一些进步思想家正是在“经世致用”精神的导引下,其文化思考和探索开始从传统跨向近代。

首先是“驭夷”问题,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遇到的首要问题。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最早接触近代报刊的中国人之一,还是仅有的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从事译报、译书活动的晚清上层人物。林则徐与新闻的关系,始于其以两广总督身份督办禁烟事宜之时,当他满怀壮志雄心来到广

州时,却发现将与之打交道的夷人是完全陌生的。深感于“沿海文官武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迫切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7]221}因此把了解夷情作为当时的迫切任务。在他的积极建议下,林则徐把翻译西书作为了解夷情的一个重要渠道。他在给奕山的一封信中写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知夷字,亦即不看。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7]476}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文人,林则徐的译报活动以及对外报的接触完全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他把经世派传统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终于使他从蒙昧无知进到追求新知的境界,从严禁鸦片到奖励通商,从盲目的天朝自大到以外夷为师法对象,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开端时期的伟大爱国者和新时代新思想的启迪者。此后,从外国报刊和书籍中获取资料,研究边防和各国历史、地理、政情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开始了更新传统知识结构的历程。

其次是政体问题,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遇到的关键问题。王韬十分崇拜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8]王韬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即“君主之国”,如俄罗斯等;“民主之国”,如美利坚等;“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吉利等。^[8]游历英伦期间,王韬曾专门去国会参规:“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实重地也。”“且国家大事集议于上下议院,必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9]他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的会议,深受震撼。人们可以在议院中公开讨论大政重务,“参酌可否,剖析是非”,自由表达意见,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王韬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

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8]充分表明了他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王韬对君主立宪制的兴趣,是他以后力主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动因。他意识到以地主官僚为首的“洋务运动”,不能带领中国从根本上走向富强,要想使中国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付诸实践。他的这些思想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声;他主办的《循环日报》,也成为我国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刊。

“经世思潮”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促使国人的视域突破了“华夷之辨”的地理限制。如果还想更深入突破根植中华大地两千余年,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制却并非易事。如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思想基础,并没有离开儒老循环变易说,他们观察社会事物,仍然是以治乱盛衰划分时代的历史循环论。这种历史观,限制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近代报刊社会功能的深层次认识,也成为近代早期“文人论政”在“经世致用”上的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6.
- [2]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0.
- [3] 马礼逊.论印刷自由[N].《广州记录报》,1833-05-06(1).
- [4]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7.
- [5] 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M](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205.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54.
- [7] 林则徐.林则徐书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8] 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M](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23-24.
- [9] 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M](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107-108.

责任编辑:卫 华